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战役理论过时了吗？

■刘成奎 王永亮 张扬

要点提示

- 战略、战役和战术理论从不同层次都反映了军事斗争的客观规律，但它们却存在范围、程度和应用条件的差别。
- 战役将国家战略目标与战斗联系起来，赋予战斗以意义，而战斗赋予战役以形态，这就好比一个管弦乐团的指挥者控制着整体的速度、节拍，并使各部分保持一致，战役指引着各个战斗的执行以达到战略目标。

实现解放全中国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军事理论研究离不开战役理论的支撑。比如，美军在越南中未正确认识到客观存在的战役，虽然取得一系列战术胜利，但未赢得战争。此后，美军开始加强战役理论研究并延续至今。1978年，美国《军事评论》杂志首次出现对战役的发声：“美军没有战役学，这是美国军事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不能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1982年，美国陆军正式颁发新版《作战纲要》，首次确认战役学是军事学术的一个独立范畴，开始弥补以往的理论缺陷。从承认战役这个作战层次以来，美军先后提出了“空地一体战”“网络中心战”“快速决定性作战”“空海一体战”“多域战”“全域战”等一系列理论，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战争形态。

再比如，俄军战役法产生于苏俄国内战争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苏军研究提出“大纵深战役理论”，成为战役法发展的重要阶段。二战后，经过不断发展和完善，苏军的战役理论逐步趋于完善和成熟。持续多年研究，今天的俄军速战制胜的新的历史阶段。苏军的“大纵深战役理论”，在卫国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针对苏联坦克集群在中欧平原地区对北约构成的威胁，美国陆军和空军提出了“空地一体战”理论，该理论后来成功地指导了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总结十几年革命战争经验，先后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十大军事原则”，对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方针、原则、形式、方法等作了精辟论述，使我军战役理论日趋系统化、条理化。这一时期，中央军委、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对各次战役所作的指示，极大丰富和发展了我军战役理论。在战役理论的指导下，我军相继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及渡江战役、解放海南岛战役的胜利，为

围、程度和条件的不同，反映着不同的物质运动形式，进行细分研究后可更精准地探寻各层次发展运动的特殊原因，更系统地分析相互间的区别与联系，从而厘清战争的制胜机理，将指挥员的主观认识在战时直接且高效地反映在作战实践上。

首先，战役是客观存在的军事实践活动。起先，战争通过战斗来完成。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仅靠小规模战斗已无法完成战略所赋予的任务，一次战斗中往往出现数个相对独立的战略方向或地区，而每一个方向或地区的作战又由若干个相互联系、有着统一目的的战斗所组成，由此，战役便开始登上战争舞台。由于战争实践和政治、经济环境不同，中外军队对战役的定义略有不同，但对战役基本规律的认识是一致的，均认为战役是处于战争和战斗规模之间的作战活动。目前进入具有智能化特征的信息化局部战争时代，这个共识依然存在。

对一些主要遂行海外军事行动的军队，可能一次战术行动也可达成特定的战役目的，比如“斩首”行动。但要清楚，一方面这个目的是有限的，另一方面，这样的战术行动不能脱离战役的指挥、控制、支援、保障而独立运行，而且这些行动大多是对付一个作战实力相差悬殊的小国或组织，在作战对象是大国、强国时，则依然是非战役作战所不能。所以，这种行动样式只是战斗发展出现的新形态，它取代不了战役。

其次，战斗不能取代战役。战役将国家战略目标与战斗联系起来，赋予战斗以意义，而战斗赋予战役以形态，这就好比一个管弦乐团的指挥者控制着整体的速度、节拍，并使各部分保持一致，战役指引着各个战斗的执行以达到战略目标。

在二者的区别上，战斗的主要特征是“勇敢+技术”，战斗行动位于三个层

次的最底层，属末端落实层，上级的战略意图、指挥员的构想决心最终要通过一次次的战斗来实现，这个行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既需要主观上的“勇敢”，也需要客观上的“技术”。而战役的主要特征是“整合+节奏”，它是对各种作战方法的综合运用，强调攻防行动的有机结合，“硬”打击与“软”杀伤的有机结合，“虚”与“实”的有机结合，强调综合利用战场空间，使近距离作战、纵深作战和后方作战相配合；战役还强调对作战节奏的把握，从整体上掌控作战的进程，正所谓一个“姗姗来迟”的师抵不上一个“快速到位”的营。同时，二者组织指挥重心不同。战斗通常有进攻和防御两种类型，非攻即防，攻防转换有一定的过程，且有明显的交战边界，协同重心靠前，强调参战力量先形成合力，再作用于对方。战役则攻防兼备，在全纵深、全时空时展开，强调各参战力量作战效果的最终叠加和整合，协同重心靠后。

从联合作战的大趋势看，战役理论不可或缺

联合作战是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信息化条件下军队遂行作战任务的基本形式。当前，“无战不联”已成为共识，在此大势下，联合作战实践离不开战役理论的指导吗？

从联合作战的本质内涵分析。“联合作战，是指两个以上军兵种或两支以上军队的作战力量，在联合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下共同实施的作战”“联合作战，是在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统一指挥下，两个以上军兵种部队以及其他力量共同参加，以网络信息体系为基础支撑……作战效能最优释放的一体化作战”，这两个典型定义都强调了“两个以上军兵种”，充分表明联合作战是从参战力量的军种属性切入的，强调

诸军兵种之间的联合一体作战，区别于以往的各军种各自为战，这是适应作战发展实际的必然要求，但它并未改变作战的客观层次，联合作战依然区分为战略、战役和战术三个层次，对应的军事实践活动分别为战略性联合战役、战区（方向）联合战役、联合战斗。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联合战斗仍需要在联合战役的框架内来研究组织实施。

从联合程度较高的外军分析。经过几次局部战争实践，美军的联合作战经验与理论较为丰富。研究发现，美军没有上下一般地将联合作战混在一起研究，而是仍然按照作战层次来构建作战力量体系，特别是更加重视联合战役理论的研究与创新。2009年，针对美军在西太地区战役级别的联合作战行动，提出“空海一体战”，2015年更名为“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2020年，在陆军“多域战”基础上，又提出联合各军种的“全域战”，这些战役理论表明了美军联合作战的发展方向。俄军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之后更加重视联合作战研究，将战役细分为特种战役、独立战役、合同战役、联合战役等4种类型，并大幅扩展了联合战役的内涵，把它作为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等军事行动中的基本作战样式。

从联合作战的协同一致性分析。战争两端连着“攻”和“防”这样一对矛盾体，随着进攻手段和兵器的发展进步，防御方法和装备也在不断完善提升，任何一方要想达成作战目的，必须实施高度的联合作战，而联合的最主要体现就是各种参战力量整合为一体使用，进行高效的编组与机动。随着参战力量的种类及军种属性增多，协同层级及协同要素逐渐庞杂，组织实施联合作战存在很多现实问题，此时更加需要先进的战役理论指导，来厘清某些存有分歧的认识，为联合战役级机关决策与组织实施联合作战提供支持，使战役布势的各个组成部分密切配合、互相补充，发挥整体合力。

战役是动态发展的，任何战役都不是过往战役的简单重复，它随着武器装备、作战方式方法等因素的发展而增添新的内容、呈现新的特点，特别是联合作战成为基本作战形式的情况下，战役的内涵和外延也在相应发生变化，随之而创新发展的战役理论，正在与时俱进地揭示人们对驾驭联合作战的主观指导规律。

（作者单位：空军指挥学院）

群策集

信息化时代，战场空间广阔，作战节奏加快，态势瞬息万变，作战决策的时间缩短、成本提高、难度增加、风险扩大，需要运用一些经济学思维来破解矛盾，提质增效。

信息不完全产生作战“决策成本”。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作战决策需要以充分的信息为基础，尽管现代侦察技术和手段的发展运用使战场日趋透明，但战争迷雾还远未消散。信息不完全仍然是常态，作战仍然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信息博弈。作战决策不得不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实施，这就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学认为，在一个决策过程中加大信息量，可以减少其中的不确定性，降低决策风险。然而，信息获取需要付出时间、人力、物力等代价，这就是决策的信息成本。为了降低作战决策的不确定性，需要尽可能多地补充完善信息，这就导致决策成本的提高。

提高决策效益应把握“边际效应”。经济学认为，决策成本直接影响着执行成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决策成本，可以更加科学合理决策。但是，决策成本的增加与决策质效的提高存在一个边际：随着投入要素的增加，产出的效益逐渐减少甚至接近于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人饥饿时，吃第一个馒头会觉得特别香；吃第

信息化时代，作战决策难度增加——不妨用点经济学思维

■齐兵

二个时会觉得还不错；到第三、第四个时会觉得可吃可不吃；到第五、第六个时甚至会产负效用。作战决策也是如此，增加投入的时间和力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取更多的信息，为提高决策质量提供参考。但即使投入再多，在一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也不可能获取全部信息，而且并非所有信息都是决策必不可少的。因此，增加作战决策投入的时间和力量，需要把握一个边际。

把握决策边界要用好“二八定律”。作战决策通常在信息不全、时间受限、人手紧张的极端条件下进行，如何把握决策成本投入的边际，是决策者要考虑的一个现实问题。经济学上的“二八定律”认为，在任何大系统中的，约80%的结果是由该系统中20%的变量产生的。因此，在时间、力量等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面面俱到不能突出重点，把80%的资源投入在能产出关键效益的20%方面，这20%的方面又能带动其余80%的发展。对于作战决策而言，就是要抓住定下决心的主要矛盾，避免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上。一旦掌握了“敌、我、天、地”等大多数关键信息，就要在分析判断情况的基础上果断定下决心，从而节约时间和精力，给下级决策及部队行动留下充足的时间。

防控决策风险须实施“群体决策”。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对复杂问题进行快速决策，又要控制决策的成本边际，单靠指挥员个人的能力往往很难完成，需要充分发挥群体决策的作用。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群体决策能够集中更多的知识优势，借助更多的信息资源，形成更多的可行方案，从而弥补信息不足的缺陷，有效降低决策风险。然而群体决策处理不当，又可能陷入众说纷纭、盲目讨论的误区之中，反而浪费时间和精力，降低决策的速度和效率。因此，作战决策中群体决策很有用，但要注意。需要注意的是，应充分发挥参谋人员的作用，积极发扬军事民主，确保作战决策快速高效。

如何提高作战共识

■董伟

挑灯看剑 作战共识是指指挥主体对战场态势、作战方法等相关情况达成一致或接近一致的理解，是各作战力量聚焦作战意图精准聚合、高效释能的认知基础。提高作战共识，需着重做好以下几点：

共建知识背景。作为人的认识结构和思维习惯，知识背景影响着主体感知外界事物的能力。指挥主体间知识背景的差异性通常会引起战场认知的差异性。尤其在联合作战中，不同作战单元的指挥主体分属各军兵种，理论知识、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等各有不同，给形成作战共识带来一定挑战。因此，应从构建联合作战知识体系入手，弥补指挥员之间知识的背景差异。要普及联合作战法规，熟悉指挥规范、行动程序、协同规则等，使指挥员学会从作战全局的视角认知战场；学习军兵种理论，掌握装备性能、力量运用、保障需求等，使各指挥员能够站在对方的视角认知战场，克服专业隔阂，以互知促共识。

深化联训实践。共同实践是达成共识的基础。训练是作战的预实践，通过联演联训构建指挥员共同的“作战经历”，能够为形成共识奠定实践基础。为此，一是抓好联合指挥训练。多级多类指挥员同步参与指挥活动，有助于了解不同军兵种关注重点、决策方式、指挥流程等差异，加深彼此熟悉程度。二是抓好末端协同训练。组织要素深层次协同演练，平台实装效能试验，有助于消除因理论值、经验值与实际值的误差而引起的作战认识和决策偏差。三是抓好经验总结交流。可以重现指

挥场景，分析对作战问题的理解、战场态势的认识、行动设计的考虑等，使指挥群体在思维碰撞、互动交流中共同学习战争。

规范作战标准。作战标准是从行为准则、标准流程、量化指标等维度，对作战指挥、行动、保障等内容的规范。对照标准实施指挥，有利于各指挥员形成共识。从指挥实践中，应着重规范5类标准：信息标准，明确各军兵种军事术语定义、信息表述格式等，利于指挥员在指挥信息理解上达成共识；效能标准，明确不同作战力量具备的能力、可达成的作战效能，利于指挥员在力量选择上达成共识；需求标准，明确遂行不同任务需要具备的条件，利于指挥员在力量编组上达成共识；指挥标准，明确指挥流程、各阶段工作等，利于指挥员在指挥什么、怎么指挥上达成共识；作业标准，明确实施某项行动必须遵守的基本流程，利于指挥员在控制部队行动上达成共识。

优化决策模式。传统的单级封闭式决策，各级各类指挥机构就像加工信息的“孤岛”，决策过程不透明，决策信息无法及时共享，指挥员之间很难达成共识。在网络信息体系支撑下，可采取分布交互式决策模式，以支持指挥员同步参与、广泛交互。在机构编组上，构成协同关系的同级指挥机构之间互派协调联络组，消除因军兵种专业知识隔阂引起的决策偏差；在决策方式上，构建各指挥员、指挥要素同步获取决策信息、同步展开决策活动的决策场景；在决策组织上，预先明确作战筹划各阶段的决策事项、时机、参与主体及主体间主次关系等事宜，确保决策活动聚焦作战意图、抓住关键问题、形成共同认识。

扎实做好教学评价工作

■印祺

观点争鸣

军队院校教学评价与地方高校教学评价相比，既有相通之处，又有自身特色，需要围绕“评什么”“怎么评”“谁来评”等核心问题不断深化认识、迭代推进

开展新一轮军队院校教学评价，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全面深化我军院校改革创新、推动军事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教学评价所蕴含的价值追求和设定的指标体系，既是营造良好教育生态的科学指引，也是院校办学质量提升的行动依据。军队院校教学评价与地方高校教学评价相比，既有相通之处，又有自身特色，需要围绕“评什么”“怎么评”“谁来评”等核心问题不断深化认识、迭代推进。

注重政治评价。办什么样的院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办学育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学校是立德树人的地方，必须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特别是军队院校培养的人，在政治上更不能有半点偏差。军队院校新一轮教学评价需要牢牢把握军事教育的政治属性，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立起政治标准，确保红色基因代代传。

注重为战评价。军队院校教学评价的根本标准是战斗力标准。深化军队院校新一轮教学评价改革，必须坚

持以战领教、为战抓教，遵循军事人才成长规律和军事教育规律，将“什么是好院校、什么是好教员、什么是好学员、什么是好课、什么是好科研成果、什么是好教研室”用打仗标准进行衡量，牢固树立为战育人鲜明导向。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哪里问题集中就突出评价哪里，以此倒逼院校办学理念、育人模式、学科专业、科研创新、师资队伍等全方位作战而行、体系重塑，进一步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同未来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

注重强评评价。面对时代之变、战争之变，世界范围内军事人才竞争更趋激烈，军事教育转型升级更加紧迫。应自觉将教学评价融入建设一流军队院校、培养一流军事人才战略布局，瞄准世界一流自我加压，既不为追求“高大上”而提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也不为追求轻松“达优”而“避高就低”，人为降低难度标准，坚决防止以“过时标准”钳制“未来发展”。要围绕不断深化教学科研管理创新，论证设计兼具开放性、发展性、比较性于一体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突出内涵建设、重视变化增量，进一步激发内在动力、鼓励个性创造、培育特色优势，切实促进军队院校加速形成新质教学科研能力。

注重部队评价。在军事人才培养链路上，院校是供给方、部队是需求方。部队队满意的教育，要深刻回答好“谁适应谁、谁服务谁、谁评价谁”这个根本问题。只有坚持学员“产品”行不行、部队“用户”说了算的

理念，加大部队参与评价的力度，才能走出院校教育自我设计、自我评价、自我满足的怪圈。引入部队评价，不仅仅是形式上邀请部队指挥员担任评价专家，还需要将端口前移到邀请部队参与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学员毕业考核题库建设上来，以此牵引院校与部队联合育人成为一种内在需求、一种制度规范、一种行动自觉。要树立科学的部队评价观，既促进院校教育主动融入部队指挥链、建设链、管理链，又实现面向部队与服务部队、学习战争与设计战争、满足需求与创造需求的高质量动态平衡。

注重科学评价。教学评价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应该服务于教学和人才培养，防止为评价而评价。为此，要坚持线上评价与线下评价一体化，综合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深度挖掘常态化教学状态监测数据，采取线上与线下结合、定性定量相结合、明察与暗访相结合等方式，提高工作实效。要坚持综合评价与专项评价一体化，通过部署实施一体化评价、建立教学评价“问题清单”，强化评价结果使用和督导复查，将接受教学评价的整改情况作为教育监察的重要内容，褒奖成绩突出的、鼓励踏实干事的、制约敷衍应付的、鞭策落后掉队的，从而正向牵引军事教育高质量发展。